



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

(下 卷)

季 謙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本書系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0—1951年版
《車爾尼雪夫斯基哲學著作選集》第二、第三卷和1948年
版《車爾尼雪夫斯基經濟著作選集》第一、第二卷翻譯。

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

(下 卷)

季 讓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0 $\frac{5}{8}$ · 插頁 5 · 字數 512,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2002·123 定價(七) 3.25元

目 录

論土地是財富的要素.....	1—15
論促進國民資本增加的若干條件.....	16—54
杜爾閣.....	55—85
對反對公社所有制的哲學偏見的批判.....	86—128
經濟活動和立法.....	129—182
迷信和邏輯規則.....	183—211
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	212—297
資本和勞動.....	298—364
國民經濟原理.....	365—384
論羅馬滅亡的原因.....	385—416
沒有收信人的信.....	417—447
1876—1878年信札.....	448—584
生存競爭有益論的來源.....	585—628
注釋.....	629—641
人名索引.....	642—657

論土地是財富的要素

亞·列沃夫著

莫斯科。一八五三年。

列沃夫先生對一個問題深感興趣：“什麼東西阻礙着政治經濟學的進展？”我們無從了解列沃夫先生為什麼要考察這個問題；但我們卻應該對這個問題加以探討，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將說明列沃夫先生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內容和方向。

事實上，就基本原理方面而言，政治經濟學還遠遠沒有達到象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所到達的那種確定不移的高度，請問這是什麼緣故呢？譬如說，天文學事實上早已不再注意那些硬說太陽圍繞地球運行的人們的解釋了；至於政治經濟學，那麼它現在非但有必要對類似的、毫無根據而作出的解釋加以認真的駁斥，甚至它仍然沒有擺脫掉陷入例如那些正在證明工業世界中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被安排得盡善盡美的人的手中的危險，請問這是什麼緣故呢？直到目前為止，政治經濟學仍不得不去反駁這些極端荒謬的見解，請問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許多人硬說這種不幸的情況是由於政治經濟學年輕：“它還沒有發展到使自己的真正原則具有透徹的、完善的、無容爭辯的性質的地步，因為它作為一門科學，一共還只存在了八十年。”但這種解釋是不夠的。為什麼它發展得這麼慢呢？要知道，化學比政治經濟學還要年輕，而比較解剖學幾乎是我們眼看着它產生的，它更要年輕些；然而在確立自己原則的完備性、準確性和公認性的程度

上，这些科学不仅把政治经济学远远抛在后面，甚至还超过了那个在年龄上说来是老太婆，在推论的无根据方面说来是小孩子的科学——历史学。可见这里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年轻，并不成为理由，甚至不能说明问题。

而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发展缓慢，是有许多理由的。让我们指出几个可以说明列沃夫先生所研究的那个问题的情形的原因吧。为了卸脱諱言其他一些原因的責任，我們姑且引用这样一句著名的法国諺語：Qui veut dire tout, ne dira rien.①

政治经济学发展缓慢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它应当分析的事实錯綜复杂和紊乱无章。天文学和其他接近完善地步的科学所分析的事实是很简单的，是并不那么头緒紛繁的，如果与我們这門科学所要分析的事实比較起来，那么就事实的簡明程度和完备程度而言，它們是太容易整理出头緒来了；至于我們这門科学所要分析的事实，則取决于許多原因，要受到許多条件的影响，它們常因自己的后果而弄得一塌胡塗。讓我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从严格的科学要求来说，这正是列沃夫先生所考察的問題——就是：在西欧占着統治地位的工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在西欧）究竟是日益改善呢，还是日益恶化？要知道，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問題彼此正是这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說明地租或土地租佃收入产生的原因时，就需要談談工人阶级的物質福利状况。天文学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天文学在解决自己的問題时，用不着去考察一些完全无關的問題；在它看来，这些問題是些“不相干的問題”，因此，当它談到地球每年一次运行的時間和原因时，它就不想而且也不應該同时注意月亮的盈亏或地軸的振动等等問題。政治经济学的情形則恰恰相反，在它研究

① 誰想把一切都說出來——他什麼也沒有說。——編者

各个个别問題时，只有主要問題和次要問題，而沒有不相干的問題，它們都和主要問題有关。当然，比起同时解决五个、十个、二十个問題而言，解决一个問題是更能迅速地达到完善和准确的地步。这还不是問題的全部。加之，政治經濟学所分析的一切事实都是錯綜复杂的，其中每一个个别的事实也都是极端紛繁的。讓我們举一个例子。我們想知道工人階級的物質福利状况究竟是在提高呢，还是在下降；或者說，为了使問題簡單化，只談談工人階級中的一种工人——法国和英国的工厂工人 (les ouvriers) ——的物質福利状况究竟是在提高呢，还是在下降。你看，决定这种現象的原因有多少；給他們的報酬 (la salaire) 依賴于：

(一) 工厂产品的銷路；(二) 力图減低这种報酬的工厂主之間的竞争程度；(三) 雇佣工人之間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也取决于(四) 其他工业活动部門的情况；(五) 这种報酬也依人民的习惯为轉移 (英国人不同意那种不能够买到肉类食物和茶叶的報酬)；(六) 工厂工作的困难程度等等；而工人怎样使用这笔報酬呢，这又取决于(七) 他們地位的穩固程度和(八) 由此而产生的安排正常开支的能力和(九) 取得或維持正常生活习惯的能力和(十) 发展或保持自己的精神特質的意識等等；他們的福利状况也在同样的程度上依賴于(十一) 粮食、住宅等等的价格；(十二) 他們住所的設備、清洁状况等等；(十三) 和(十四)……要知道，这份目录远不是完备的，但根据这份目录，已經足以看出解决这个包含这么多因子的方程式 (用数学术語來說) 是多么困难了。而这只是以簡化了的的形式表述的最簡單的問題中的一个。反之，如果我們拿天文学的主要問題来看：“引力是按照什么規律起作用的？”——要解决这个問題，只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 距离和(二) 把一个东西引向另一个东西的物体的質量。显而易见，如果要給这个規律下个明确的定义，那么要比解决象工人階級的福利状况这样的問題容易得多。科学能

够迅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所分析的事实简单性。因而，甚至一门科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发展程度经常也是很不相等的。例如（在物理学方面），光学在解决自己那些并不复杂的问题方面，就比气象学完善得多，因为气象学所研究的事实是相当复杂的；又如，人们对无机化学的研究要比对有机化学的研究有成绩得多，因为无机化学所分析的物体的构成要比有机体的构成简单些。

造成准确解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困难的这个原因，乃是与研究者不相干的、不关痛痒的原因。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对于顺利解决政治经济学各个问题的阻碍，——这是一些由喜爱和偏袒、好感和恶意所造成的阻碍。

大家知道，医生从来不医治自己的亲人；当医生的老婆孩子生了重病的时候，那怕是最有经验的、最有自信心的医生也要去请另一位医生来诊病，也许请的是一位他本人都相信是经验较差的医生。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医生对病人过分关心，这就妨碍他对病人情况作清晰的、敏锐的判断；当他深信疾病有危险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持镇定呢？为了不致于对果断的治疗的结果有毫无根据的担心，他能不能保持沉着呢？他敢不敢宣布 *medicamenta non sanant, ferrum sanabit* 呢？^①不，他所尽量注意的将不是那些坏的征兆，他会被一些好的征兆所迷惑，他将去寻找一些治标的办法，而这些办法往往是毫无用处的。对于自己的亲人说来，任何大夫都是不高明的医生。政治经济学家的情形也几乎总是这样，如果他不是冷酷无情的写作机器的话。因为问题是同人们的命运有关的；谁能不赞同、不盼望有利的答案呢？如果要忠实地解决科学问题，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不关心、不理睬答案将会如何。真理的探索

① 如果药方无效，那就要动手术。——编者

者應該仅仅探求真理，而不应当为了使真理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不應該由于想到将来获得的答案是什么而战栗。对数学家來說，無論得出的結果是正数还是負数，反正是一回事；在他看来，任何結論都是好的，都是可爱的，只要它是正确的就行。对于研究历史問題的人而言，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而对于研究政治經濟学問題的人，就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他不能不盼望有利的答案。願望对于結論不可能沒有影响。他希望得到什么，他就会得到什么。

如果說我們不可能不盼望有利于人的事情，那么我們也同样沒有权利不盼望有利于人的事情。就讓这种爱阻滞着走向严格真理的道路吧；但如果沒有它，我們也就不可能达到真理：誰不热爱人，誰就不会想到人。不过，另外还有一种瑣碎的、在科学事业上值得怜悯的眷恋心——这就是对于自己个人利益和对于自己亲近的人的利益的眷恋心，即使它們同人民和国家的幸福处于相反的地位。然而大部分人在自己进行推論和研究时，都被这种偏爱糾纏住了。

这就是阻滞政治經濟学迅速发展的三个最重要的障碍物。此外还有一些也相当重要的障碍。但是——越往树林里走，劈柴就越多，而我們已經說得这样过于燕杂了。列沃夫先生在考虑“政治經濟学的不稳定性”的时候，完全沒有談到这些障碍中的任何一个障碍；而在他看来，主要的障碍似乎是：“由于科学和技术之間沒有精确的分界綫，这便妨碍了政治經濟学的进展。”知否，德斯杜（德杜？[⊖] Destutt）·德·特拉西曾說过：“技术乃是为达到預期后果而必須恪守的清規戒律的汇集；而科学則在于通过对某种对象的研究而揭示真理。”政治經濟学家們对这两句話并未給以应有的注

⊖ 想必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怀疑这个资产阶级經濟学家的名字是否應該这样念。——編者

意：一切不幸都由此而来！但是，至少从指令（查理曼大帝就已经对自己的管事下过指令了）和学术论文之间的区别已为人所周知的时候起，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也被大家所知道了；如果说经济学家们并不知道这种区别，那么他们之所以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这门科学动摇不定的状态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当科学的基本问题的解决还动摇不定的时候，那么科学的范围也将是动摇不定的；而当科学的基本问题被阐明的時候，那么科学同各种技术的区别，甚至和那种粉饰事实的技术的区别，甚至和那种光说两三句所谓个人自由不可侵犯云云的空话，但回避认真地讨论靠政府的措施在人民难以忍受的工业紊乱状态中整顿秩序，结果尽说废话的技术的区别，——也就是和那些作为列沃夫先生的权威者、以及站在这批人前列的假充思想深刻的巴斯夏的特色的技术的区别，自然而然也将被阐明。但列沃夫先生却毫无根据地认为这些先生把科学和技术混淆起来了：从那位断然决然地说“政治经济学只记述，而不想提出什么建议”的讓·巴斯蒂特·薩伊起，那些学会背诵他的作品、并从这个立足点着手把科学向后挪动的人们，都彻头彻尾充满了这个基本思想。他们知道和恪守这种区别，但是巴斯夏、罗西、米謝里·謝瓦里叶这一批人，却全都没有把科学解释清楚，而只不过是沾污了它。請問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比起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来，他们更好地知道论述对自己有害的东西和有利的东西的科学，他们更好地知道只谈到和只叙述对他们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有利的东西的技术，顺便说说，知道为了使科学撇开其他问题而重新研究早已解决的问题的技术，知道那种尽可能缓和在解决问题时还会使自己亲人感到难受的东西的技术，知道那种尽可能证明工厂工人生活过得比工厂老板更舒服的技术。列沃夫先生根据他们的話所阐述的地租学说，为技术的这一方面提供了絕妙的例子。这种学说，这些反駁李嘉图的

言辞——真是有趣的东西。

土地占有者由于出租自己的土地而得到的报酬，被称为地租。它经常是多大呢？它经常是按照所出租的土地提供收入的多少而定的；收入则首先依赖于土地的肥沃程度。所以土地的肥沃程度决定着土地的出租报酬的数量。这个道理往往是人人都知道的。

但李嘉图并不满足于这种不肯定的答复，他想精确地判明租佃者为租用土地所付出的究竟是多少，并且他究竟根据什么理由而付出地租。应当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他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分析得也颇为正确。这就是他的“地租论”的实质。

一支人数很少的民族来到一块荒凉的土地上，开始耕种这块土地。每个人都耕种他有能力耕种的并且愿意耕种的土地（现在美国西部各州的情况几乎正是这样，而八十年前，俄国东南境内的情形也完全如此）。不言而喻，他们所耕种的只是最好的土地：当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耕种任何一块土地的时候，谁不愿意耕种最好的土地呢？假定说，这一类土地每俄亩可以出产十契特维尔特的^①的粮食。人口渐渐繁殖起来；从这些最肥沃的土地上所收获的粮食不敷居民的食用了。于是就需要去耕种那些每俄亩只出产九契特维尔特粮食的土地。试想一下，这时候我是愿意从事农业的。我可以免费取得第二类土地，它还有许多是闲着的，而第一类土地已经全被人们占住了。但也许：第一类土地占有人当中有某人不愿务农了；他是不是会让我享用他的土地呢？要知道，不耕种的土地不是反正不会替他带来什么东西吗？不，他有另一种想法：“如果你去免费耕种还闲着的土地，你每俄亩会得到九契特维尔特的粮食，而我的土地将使你得到十个契特维尔特的粮食；你怎么会多

^① 谷量单位，合二〇九·二一公升。——译者

得到一契特維爾特的糧食的呢？土地是我的；既然它比其他的土地好些，我就要因此得到點好處；如果你願意耕種它的話，那麼你得給我每俄畝一契特維爾特的糧食。”我也同意給他，因為對我來說，好處反正一樣。這就是使用土地的報酬的起點——地租的起點。如果第一類土地還有閑着的，那麼我是不是會同意這個條件呢？不，我會對土地占有者說：“你究竟憑什麼要我每俄畝給你一點點糧食呢？你不把自己的土地免費給我，我就免費去取還閑着的土地。”而現在，我可以對第二類土地的占有者這麼說，因為在這一類土地中，還有一些可以免費享用的荒地；第二類土地現在還不產生地租。但人口還是增殖不已，一直增殖到所有第二類（出產九契特維爾特糧食的）土地都被垦種了，於是就需要去開垦每俄畝只出產八契特維爾特糧食的第三等土地。如果這時你想耕種第二類土地，那麼占有者就可以向你要求每俄畝一契特維爾特的糧食，因為你不能白白地耕種出產超過八契特維爾特糧食的土地；至於第一類土地的占有者，那麼就會因此向你要求每俄畝二契特維爾特的糧食。總之，地租是由已耕種的土地中最壞土地的收入和出租土地的收入之間的差別所測定的。最壞的土地耕得越多，最好的土地的地租就越高。顯然可見，地租之所以有可能存在，正因為並非所有的土地的質量都相同，正因為一國之中最好的土地的数量只是有限的，而遠不是無限的，並且，也因為所有這些土地早已變成私有財產了。

但我們所談的是用實物、糧食支付的租佃報酬；因為自從工業發達以來，一切支付都開始採用貨幣，而不採用實物了。讓我們看一下，在我們按已耕土地種類所規定的不同時期內，地租究竟佔到多少數額的貨幣。大家知道，人不可能長期從事無法維持生活的工作；工作者會破產，會死掉，否則他就得放棄這樁虧本的行业。總而言之，糧食價格總規定得能使耕種者維持生活；否則他就會不干

农业了。假定說，一个农人可以耕五俄亩土地，他每年的費用需要一百个銀卢布。如果按照人口的数目，不仅有必要耕种第四类土地（每俄亩出产七契特維尔特粮食的土地），而且也有必要耕种第五类土地（出产六契特維尔特粮食的土地），那么粮食的价格应当固定在这样的水平上：使得第五类农人能用自己的粮食換得一百卢布（每俄亩出产六契特維尔特粮食，五俄亩一共出产三十契特維尔特的粮食），否則他就会不干农业，第五类土地就会沒有人去耕种，居民就会感到粮食不够吃，而粮食价格就会更加提高。总而言之，粮食价格应当固定在这样的水平上：如果低于这种水平，那么耕种最坏耕地的人就要破产。讓我們看一看，在經常耕种一切最坏的土地的情况下，货币地租的数量将是多少。

第一个时期。人們只耕种每俄亩出产十契特維尔特粮食的土地。农人从五俄亩（ 5×10 ）共得到五十契特維尔特的粮食。粮食价格（出卖五十契特維尔特粮食应得到一百个卢布）为二卢布。这时沒有地租。

第二个时期。人們耕种第二类土地（每俄亩出产九契特維尔特粮食）。粮食数量为四十五契特維尔特。价格（ $100:45$ ）为二卢布二十二戈比；五俄亩第一类土地的地租（每俄亩一契特維尔特粮食）为二卢布二十二戈比乘五，等于十一卢布。第二类土地这时不产生地租。

第三个时期。人們也耕种第三类土地（每俄亩出产八契特維尔特粮食）。粮食数量共为四十契特維尔特。价格（ $100:40$ ）为二卢布五十戈比。五俄亩第一类土地的地租（每俄亩二契特維尔特粮食）共为二十五卢布；第二类土地（每俄亩一契特維尔特粮食）則为十二卢布二十五戈比。

第四个时期。人們也要耕种第四类土地（每俄亩出产七契特維尔特粮食）。粮食数量为三十五契特維尔特。价格（ $100:35$ ）为

二卢布八十三戈比。五俄亩土地的地租是：

第一类土地(每俄亩三契特維尔特粮食)为四十二卢布四十五戈比；第二类土地(每俄亩二契特維尔特粮食)为二十八卢布三十戈比；第三类土地(每俄亩一契特維尔特粮食)为十四卢布十五戈比。

第五个时期。人們也要耕种第五类土地(每俄亩出产六契特維尔特粮食)。粮食数量为三十契特維尔特。价值(100:30)为三卢布三十三戈比。五俄亩土地的地租是：

第一类土地(每俄亩四契特維尔特粮食)为六十六卢布六十六戈比；第二类土地(每俄亩三契特維尔特粮食)为五十卢布；第三类土地(每俄亩二契特維尔特粮食)为三十三卢布三十三戈比；第四类土地(每俄亩一契特維尔特粮食)为十六卢布六十六戈比。

总之地租是在不断提高着；这一方面是由于从各类土地所得到的粮食数量之間的差别的增大，另一方面也由于粮食价格的上升。人口越多，人們所耕种的土地就越来越差(农人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产物就越来越少)，粮食价格就越来越高，人民因此就更加贫穷，那么地租也就更多了。

这一切都很正确，这一切既深奥，又简单。

对于李嘉图的結論，不可能有什么异議，但是——瞧这个証据，政治經濟学的問題是多么复杂，——但是，即使这样完全正确地解决了問題，也不等于彻底解决了它，因为李嘉图所談到的只是問題的一个特殊的方面，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結論从理論性的見解方面搬到实际的、現代的关系中去；馬尔薩斯反对他的理論时的正确面就在于此。李嘉图在判断粮食价格时，所考虑的只是农人的要求，并且始終以可以无偿利用的、还閑着的土地的存在为前提；所以在他那里，只有耕种一些土地所得到的价值超过耕种另一些土地所得到的价值数量的部分才构成地租。但是，如果說粮食价格

不能低于李嘉图所提出的界限，那么它却可能高于这个界限，因为当人口比可耕地数量和可耕地出产的粮食数量大得多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形：这时，由于买者所需要的粮食多于卖者所供给的粮食，粮价就要上涨；譬如说，在第五个时期（假定第五类土地是可耕地中最坏的土地），粮食价格就不会象李嘉图为粮食够用时所推算出的那样：三卢布三十三戈比；粮食价格可能涨到三卢布五十戈比、四卢布、五卢布。西欧大部分地方经常是这种情形。这时，农人从他所耕种的五俄亩土地上得到的收入如下：

土 地	第一类 (10契特 維尔特)	第二类 (9)	第三类 (8)	第四类 (7)	第五类 (6)
粮食数量	50	45	40	35	30
款 额 (假如每契特維 尔特价4卢布)	200	180	160	140	120
作为收入差 额的地租	80	60	40	20	—

但在这种情形下，农人可能留下一百二十卢布；而维持生活只不过需要一百卢布。土地占有者是不是会让农人留下这剩余的二十卢布呢？不，他会说：“在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在每个人都只忙于张罗糊口的粮食的时候，我总会找到那些满足于一百卢布收入的租佃人；他们会比你多给我二十卢布；这就是说，要末你再多给我二十卢布的地租，而满足于一百卢布的收入，要末我就按照这些条件去找另外的租佃人。”由此可见，李嘉图的结论需要这样补充一下：最低地租和最高地租之间的差额事实上取决于土地收入的差额，而最低地租则取决于最坏土地的收入超过补偿农人的费用的多余数额；于是，凡在粮食价格不由生产费用决定，而超过生产费用（由于人口过剩或其他原因）的地方，可耕地中最坏的土地也产生地租（李嘉图忽略了这一点）；至于其他一切土地的地租，也都因为这笔地租数额而增大起来。英法等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李嘉图理論中还有不完备的地方；他从“地租取决于所得到的粮食的数量和价格”这个一般規律推出了这样的結論：地租本身对于粮食价格是沒有影响的，所以即使減低了地租或取消了地租，得到好处的只不过是农場經營者階級，而非全体人民，因为粮食价格并不会下跌。西斯蒙第早已指出这个見解的錯誤性。如果要把一切可能使得价格随着地租的减少而降低的关系都解释清楚，那就需要过长的篇幅，所以我們只指出一点：假定农場經營者所留下的不是一百卢布，而是一百二十卢布，那么他就可以把这留作开支的二十卢布用来改良土地，改良自己的工具等等（他可以依靠較多的資本来耕种土地了），这时候，他就可以得到較多的粮食了：不是五十契特維尔特的粮食（第一类土地），而是六十契特維尔特的粮食；不是三十契特維尔特的粮食（第五类土地），而是三十六契特維尔特的粮食；假定說吧，由于粮食数量的增多，粮食价格从四卢布跌到三卢布五十戈比，那么他还是会得到比以前較多的利益（每契特維尔特的粮食价四卢布，五十契特維尔特粮食带来二百卢布；如果每契特維尔特粮食价三卢布五十戈比，而六十契特維尔特粮食則带来二百一十卢布，在这二百一十卢布中，扣去八十卢布的地租，他还留下一百三十卢布，但往年他只剩下一百二十卢布；同样的道理，如果每契特維尔特粮食价四卢布，三十契特維尔特粮食带来一百二十卢布；如果每契特維尔特粮食价三卢布五十戈比，那么三十六契特維尔特粮食就带来一百二十六卢布），从而他就有可能繼續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生产、降低价格等等。有許多原因能使地租的降低影响价格的降低，而这里所談的只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我們之所以只談到这个原因，因为它比其他的原因較易于証明。

总而言之，李嘉图的理論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并不十分完备；这个理論只解释不同土地的地租为什么会有差别，而沒有提到即使是最坏的耕地也能带来地租；既然他沒有說明这一点，所以他所

推算出的地租要低于地租的实际数量，因为他只是根据生产充裕的条件来考虑地租，而不是根据生产不充裕的条件来考虑它。

但有許多人不喜欢李嘉图的理論；为什么呢——这就与我們不相干了，虽然从他們的反对意見中可以看出他們为什么恰好讨厌这个理論。这些反对意見乃是那批冒牌学者解說政治經濟学的絕妙样品，这批人懂得探寻真理的科学和“把可爱的东西与有用的东西混在一起”的技术——其目的在于恢复被科学所破坏的那些在我們看来是可爱和有用的人們的美名——之間的差別。所有这些反对意見要末是字面上的吹毛求疵，要末就是攻击这个理論的正确的、但难以了解的方面。讓我們根据列沃夫先生的闡述把它們审查一下。

按照这些先生們(巴斯夏、加雷等人)的意見，李嘉图弄錯了，因为他說：耕种是从最好的土地开始的，到了以后，随着需要的程度，人們逐漸轉而耕种那些較坏的土地。你知道嗎，貧瘠的阿提刻比肥沃的比奧細亞先被人們耕种(这是何从知道的?)，上埃及的干燥土地比肥沃的三角洲等地先被人們耕种，而莫斯科省或特維尔省也比西姆比尔斯克省和薩拉托夫省先被人們耕种。当然，誰也不想断言人們最初居住的正是地球上最肥沃的地方(虽然一般說来，这是正确的：南欧比北欧先有人烟，先被人們耕种；小亚細亞、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又比南欧先有人烟，先被人們耕种)，但問題与此无关。特維尔省的粮食价格很少靠比薩拉比亚的粮食价格来决定，德国的粮食价格也很少依西西里或小亚細亞的粮食价格为轉移；李嘉图所談的是构成一个經濟整体的地区，人們在耕种这一带的土地时，并不知道几千俄里之外还有更肥沃的地区，或者說，他們不可能迁移到那兒去；他所談的是每个个别地区的价格和地租的变动，在这些地区之内，粮食价格总是相同的；甚至在現在，象这样的区域还不算大，而在以前，在交通情形非